

邓小平经济思想与发展经济学的复兴

2005-2-24 李天华 阅读958次

一、发展经济学的兴衰演变

“发展经济学”，就广义而言，可以包括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根据这个定义，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是最早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著作。但真正系统的发展经济学著作，最早要属马克思从1867年开始发表的《资本论》。这部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趋于灭亡的必然趋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则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1938年，威廉·吕彼克发表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发表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1945年，中国学者张培刚在美国哈佛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公认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此后，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或经济发展的专著相继出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二战后的大规模经济重建，以及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热潮，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在经济学界蔚然兴起，一时学习研究成风，专著层出不穷，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的相继提出使发展经济学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大多对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充满自信。这一时期，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依靠计划化、国有化与进口替代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一般尚未认识到市场机制、农业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倾向同样反映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占据当时的主流，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计划化、物质资本积累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论证。其中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模型”、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等。这些理论尽管论点不尽相同，但都极大地充实了当代经济学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如战后初期所期望的那样实现经济现代化，反而问题丛生，困难重重。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日益扩大。伴随着从60年代末开始的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全面复兴，人们对早期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不仅对以往发展经济学所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加以否定，甚至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产生了怀疑。许多人只不过把发展经济学看成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派生形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极力强调市场机制的不可替代性，反对政府干预，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和谐的、渐进的过程，只有让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自动调节，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由于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来自发达国家，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常常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倾向，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最终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也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去考虑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很难找到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公认，二战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发展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趋于衰落，面临着学科的危机。一些人甚至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即将“死亡”的悲观论断。

二、邓小平经济思想对复兴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为了摆脱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不少发展经济学家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们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经济学中没有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因此，发

展经济学就其任务而言，仍然是极其有生命力的。但只有在研究立场、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彻底的改造和革新，发展经济学才有可能获得复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开放道路。邓小平经济思想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格外突出的地位，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邓小平经济思想在多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复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一，邓小平经济思想立场鲜明，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把发展经济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考虑。因此，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按照西方的经济概念和经济范畴来分析其发展问题，遵循西方的经济原则和道德准则来规范其经济行为，根据西方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要求来构造其体制结构，这样势必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经济利益。邓小平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同时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态度鲜明地指出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他科学地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阐明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因此，需要推动南北对话，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他也提醒发展中国家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吝啬。要富国多拿点钱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只有推动南北对话，进行南南合作，才能加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当然，这并非易事。

事实上，一些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例如刘易斯、普雷维什、辛格和缪尔达尔等人早就提出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收入需求弹性较低的初级产品为主，贸易条件长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再加上发达国家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垄断，致使国际自由贸易制度不可能给所有参与者都带来相同的利益。不合理的进出口交换比率会加剧国际上收益的两极分化，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因此，他们大都反对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然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实行对外开放，会严重制约和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代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已经造就了一个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所以尽管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关系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只有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才有可能改变它。对外贸易作为一种直接影响对方经济利益的方式，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用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说：“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弊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2001年，中国历经1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完全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发言权越来越大，这样就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

第二，邓小平经济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境界。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一直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不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邓小平经济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国际主流社会的经济体制接轨，使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现实基础。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后来，邓小平针对人民思想上的困惑和认识上的分歧，又多次阐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两者都是手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而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求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

经济的宏观调控；既要求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又要求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带来了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邓小平在发展经济学从未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大胆尝试，为中国设计了边际增量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其基本特征是：（1）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先农村后城市的非均衡推进方式。1985年6月，邓小平表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2）重点发展与平衡发展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冲破平均主义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束缚，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一些大中城市率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也通过合法经营率先致富，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防止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3）把市场化与私有化分开，使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私有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仅在实践中较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问题，而且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如亚洲开发银行在其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验学习，逐渐减少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建立起竞争性市场经济，同时避免大爆炸式改革常常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和经济动荡。

第三，邓小平经济思想围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中心展开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论述，为改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启示。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发展问题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复杂过程。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发展经济学就比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甚至政治经济学在更高的程度上关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条件，以某种方式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迅速变革，而这些将最为有效地给其人口的最大多数带来经济进步的果实。尤其对于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单纯就经济论经济，难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的途径。邓小平经济思想围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中心，超越单纯的经济学范畴，从文化、历史、政治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发展问题展开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论述，为改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启示。例如，邓小平深知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使得人们“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传统的保守思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邓小平提出一定要解放思想。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就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方案，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邓小平也非常重视从历史中总结发展经验。他说：“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正是由于邓小平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得以顺利推进。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到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中国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大力推进经

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在21世纪继续推动发展经济学与时俱进

邓小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对发展经济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理论是永远向前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在21世纪需要继续与时俱进。2003年10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中共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把发展经济学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只关注经济总量尤其是GDP总量的增长而忽略经济发展中社会公平、资源消耗和人的发展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片面追求GDP高增长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早已显现。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为此，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取得明显进步，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这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等，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领域体制和机制完善等。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共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就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中国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式，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

综上所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大丰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完全顺应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推动

着发展经济学在21 世纪继续与时俱进。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1期

网站编辑：杨丽华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